

Ou-yang Hsiu, An Eleventh Century Neo-Confucianist. By James T. C. Liu. (Stanford, Californi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7. vii, 277 pp. Glossary, Bibliography, Index. U.S.\$6.50)

宋史研究，近年因法國「宋史研究計劃」的推展，頗為歐、美漢學界所注意。然歐、美人士因趨向時尚，競相以研究近代中國為高，雖法人之對宋史研究之加以提倡，但因限於功力，至今仍未有具體表現。劉子健先生此書，雖云為其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一書英譯，但如將中、英文兩書比較，當可見兩書之迥然不同，也可見作者學術造詣之深。此書共分十二章：

- 第一章：前言 (Prologue)
- 第二章：歷史背景 (The Historical Setting)
- 第三章：早期功業 (Early Career)
- 第四章：小規模政治改革 (The Minor Reform)
- 第五章：黨派主義及批評勢力 (Factionalism and Critical Power)
- 第六章：後期功業 (Later Career)
- 第七章：古文家 (Classicist)
- 第八章：史學家 (Historian)
- 第九章：政治理論家 (Political Theorist)
- 第十章：宋代文學宗匠 (Master of Sung Literature)
- 第十一章：理知主義及宗教 (Rationalism and Religion)
- 第十二章：結語 (Epilogue)

從上面的分章看來，可見作者對歐陽修的研究，確有深入的了解。近人對歐陽修的研究，多從其文學成就出發，鮮有對歐陽修作一全面的研究。雖也有人對歐陽修的史學觀點提出商榷，但這不是抄襲前人之說就是斷章取義，絕少特殊貢獻。劉先生在分析歐陽修的史學成就時，就明確指出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，本出

自歐陽修（頁一〇〇）。當然，歐陽之後，另一史家宋濂也有同樣說法。（註一）可見歐陽修也是此說的前驅。

更進一步劉先生指出：歐陽修對司馬遷的史學方法，並不贊同，因司馬遷只注重材料的搜集而不加以選擇（頁一〇一）。歐陽修主張歷史必要根據事實。他當然也有特殊的偏見，在他編撰新唐書時，他對許多有關材料都摒棄不用，這點極受後來史家所非議（頁一〇八）。劉先生在指出歐陽修對太史公批評，再提這點，使讀者對歐陽修的史學觀點有更進一步的認識。然而，太史公對於史料的去取標準，從太史公五帝本紀就可知道。史公治史對材料真實性的要求並不太高，信以傳信，疑以傳疑，以期對史料有更多的保存。我們對太史公的批評是因他對材料有些貪多務博，以致保留許多有關上古史傳說資料而已。歐陽修對太史公的批評站在儒家立場是中肯的，今錄史記五帝本紀贊以證歐陽修對太史公了解是如何：

「太史公曰：學者多稱五帝尚矣！然尚書獨載堯以來，而百家言黃帝，其文不雅馴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，儒者或不傳。余嘗西至空峒，北起涿鹿，東漸於海，南浮江、淮矣。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、堯、舜之處，風教固殊焉，總之，不離古文者近是。予觀春秋、國語，其發明五帝德，帝繫姓章矣，顧弟弗深考，其所表見皆不虛，書缺有間矣。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，非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。今并論次，擇其言尤雅者，故著為本紀書首。」

歐陽修在帝王世次圖序就指出五帝皆出於黃帝為不可能的事實，所攻擊的重心就是五帝本紀。其後清朝的崔述著考信錄辨證古史中不可信的故事，也是站在儒家立場，凡是違反儒家說法的全認為不可靠。

另一方面，歐陽修對當代史的搜集，極有貢獻（頁一〇二）。劉先生提出這點，極為重要，因宋人對當代史極為注重。應該指出，南宋朱熹對當代史之極度

註一：宋濂六經皆史之說，見宋文憲公全集卷七十五凝道記下頁十五下至十六上。又六經皆史談，可參考錢鍾書談藝錄頁三一五附說二十二，實齋六經皆史說探源補闕，一九六五年八月香港龍門書店重印本。

重視，可說是受歐陽修的影響。至於歐陽修所提出之正統氣節……等問題（頁一〇九及一一一），也替南宋理學家播下了種籽，使朱熹的思想和史學觀念有所依據。

歐陽修的政治理論，大體以「和」為主。劉先生對歐陽修的行政有下列的評價：簡樸 (Simple)、優閒 (Relaxed) 和合理 (Reasonable)（頁一二一）。劉先生可說是第一個重視歐陽修政治理論的人。事實上，過往學者對歷史人物的研究，往往只注重他整個事業的一部份，而忽略了人物其他方面的成就。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本來已打破了這墨守成規的寫法，可惜近年沒有人加以發展。劉先生採用這筆調來分析歷史人物，可說是對史學研究開拓了一條更廣闊的道路。

歐陽修的最高成就，就現代眼光來說，當為其文學上的修養（頁一三一）。劉先生明確指出歐陽修的文學成就乃步韓愈後塵，且負改革文學體裁重任，但韓愈只重改革文體，而歐陽修則連詩體也一併改革，這點對宋詩發展有更大影響（頁一三一至一三二）。史家對事物的分析，應具有尖銳的眼光，才算是上乘的史學人材。劉先生在其著作中，不止一次地表現出他獨到的分析能力。

在改革文體方面，有尹洙、蘇舜欽作歐陽的先導，改革詩體則有蘇舜欽及梅堯臣作先鋒。但沒有歐陽的領導，並不能推翻當時流行的文體；沒有他主持，也不能推倒當時控制詩壇的「西崑體」。在論及歐陽修的宗教觀時，劉先生舉出許多史實證明歐陽修的宗教信仰是「衛儒關佛」（頁一五九至一六一）。這點歐陽與韓愈又有點相似，歐陽修之關佛，是本民族思想，本經學思想。宋時老學為帝王所尚，故歐陽修只關佛而不伏老。與韓愈之兼關佛、老，又迥然不同。

有關歐陽修「朋黨論」一文的提出，劉先生在書中詳細地指出歐陽修作此文的主因（頁五四至五六）。更引用葉水心的見解來闡明歐陽修「朋黨論」一文是為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政論而發（頁五六）。這些雖然只是點點滴滴集合而成，但這已可見劉先生在史學方面的成就及其卓越的史識。北宋的黨爭，形成「君子、小人」的劃分，（註二）歐陽根本就沒有這種觀念，因宋時黨爭人物，兩方面全為

註二：有關宋代黨爭問題議論，可參閱王桐齡中國史第三編第七章。

君子，只出發點不同而已。但可惜他在無意間捲入這些漩渦，致使他的意見被人家誤解，直至最近，一般史家談及北宋或南宋的黨爭，特別是元祐和慶元之間的一段，都提出歐陽修的「朋黨論」作為每次黨爭的特有資料，而忽畧歐陽修當時提出這問題時的時代背景和他個人的真正動機。我們非常感謝劉先生在這方面有着明確的指出，雖然這不是在替歐陽修翻案，但這在史學研究領域中，劉先生已經給予吾人一個很好的啓示，也給一般盲目附和的學者來了當頭一棒。

在宋朝的變法等問題，許多人都提出王安石，然鮮有人道出王安石與歐陽修的關係。王安石之成為歷史人物，歐陽修具有極大的影响力。事實上，在北宋變法期間，在王安石之前，已有范仲淹、韓琦、富弼、歐陽修、李觀等人（註三）都是王安石的前驅。中國歷史人物的形成，當然不單要靠自己的能力，還要靠許多外來的條件和前驅者的鋪路，才比較有機會踏上坦途。在講及各人關係時，劉先生都有清清楚楚的交代。

劉先生此書是近年學術著作中值得表揚的作品，牠在歐、美漢學界當更能獲得重視。評者對本書如果有意見，那也只是個人觀點問題。劉先生把左傳、公羊傳，穀梁傳的「傳」字譯作 Tradition（頁一〇〇），雖然這是一般漢學家所採取的譯法，但評者終覺此字不能譯出該字的精髓，同時也可能使人產生誤解，故建議將此字羅馬化便成。

作者在前言中希望此書能受研究宋史國人注意，評者以為這點應毫無問題，因為作者之歐陽修之治學與從政問世後，各地都有書評出現，可見各地學者對劉先生著作的重視。停頓多時的宋代研究計劃，傳記方面已由傅蘭克先生（Herbert Franke）繼續推展，劉先生一早已為該計劃的支持者。希望劉先生在繼歐陽修一書后，能有更多宋代人物研究作品問世，使宋史研究得以開拓，使宋史研究工作進展，重操於國人之手。

趙 令 揚

註三：有關李觀事，可參閱 Balazs Etienne “Ein vorläufer von Wang An-schi” *Sinica* 8 (1933), 165-71 或 *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*, translated by H. M. Wright, 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64, pp. 277-289.